

《易传》作者问题检讨(上)

郑吉雄 傅凯瑄

摘要:自汉以降,学者多信孔子(551—479B. C.)作《易传》而无异说。^①北宋欧阳修(1007—1072)始疑《易传》作者非孔子,清人崔述(1740—1816)《考信录》踵事增华,再经康有为(1858—1927)推波助澜,至二十世纪的古史辨运动达到最高峰。学者除疑《易传》作者非孔子,又因认定《易》为卜筮之书,进而怀疑孔子是否确有读《易》、传《易》之事。近五十年来,学界多方探讨孔子与《周易》经传之关系,加以马王堆帛书出土所提供之新材料,学者多重拾传统说法,肯定《易传》与孔子之关系。本文以时代为序,介绍各时代学人较具代表性的看法,并简要评述其主张及研究方法,期有助于厘清此一问题的根源、历史发展及其影响。

关键词:《易传》;《易经》;孔子;疑经;古史辨;经传分离;传承经义

一、前言

传本《易传》包括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、《系辞传》、《文言传》、《说卦传》、《序卦传》、《杂卦传》等七种^①。自汉以降,学者多相信孔子(551—479B. C.)作《易传》而无异说^②。宋代欧阳修(1007—1072)撰《易童子问》质疑《易传》中有部分内容非圣人之言,为学界疑《易传》不出于孔子之始。清中叶崔述(1740—1816)《考信录》踵事增华,提出更多论据,以证《易传》非孔子所撰著。怀疑《易传》非孔子所撰之门牖既已开启,后世学者遂得扩大,而二十世纪的古史辨运动更将之推至高峰,甚至进而疑及孔子是否确有读《易》、传《易》之事。学者各抒己见,百家争鸣,对于《易传》作者及时代等相关问题,提出种种异说。

前贤在考察《易传》作者的问题上,已有不

少重要的研究成果。张心澂(1887—1973)《伪书通考·经部·易类》收录自汉代以迄1930年间学者对《易传》作者、时代的各种意见,并加以辨证^③。黄沛荣《孔子与周易经传之关系》针对孔子作《易》、读《易》、赞《易》、传《易》等问题,整理学界之重要意见并进行论证^④。何泽恒《孔子与易传问题复议》从文献释读及学术史的角度也提出了若干看法^⑤。杨庆中《周易经传研究》第八章“孔子与《易传》”将历来对于孔子与《易传》关系之说法,分为“否定说”、“肯定说”、“谨慎肯定说”三类,对于近人的研究成果介绍尤为详尽^⑥。徐威雄《先秦儒学与易关系之研究》第四章“有关《易传》诸问题的再观察”则聚焦于《易传》是否为孔子所作,《易传》各篇出现的可能年代,及《易传》中道家思想等问题^⑦。五位学者除了整理前人的成果,也各自提出了坚实的论证。

作者简介:郑吉雄(1960—),男,香港人,香港教育学院文化史讲座教授兼协理副校长(课程发展),荷兰莱登大学国际亚洲研究院欧洲汉学讲座,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(退休),香港;
傅凯瑄(1978—),女,台湾台北人,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生,台北,11657。

为呈现自宋以迄当代考辨“《易传》作者问题”的发展变化,本文在写作上以时代为序,介绍各时代学者较具代表性的说法,并就其主张及研究方法简略评述,期有助于厘清此一问题的根源、历史发展及其影响。

二、《易传》与孔子之关系

《易传》之作者为谁,在先秦典籍中未见记载。今日所可见最早之记载,为司马迁(145—86B. C.)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:

孔子晚而喜《易》,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。读《易》,韦编三绝,曰:“假我数年,若是,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。”^⑧

按:此处“序”字究竟是《序卦》的简称,抑或用为动词?倘用为动词,又应作何解释?后人对此有种种不同的说法^⑨。班固(32—92)《汉书·儒林传》谓孔子:

晚而好《易》,读之韦编三绝,而为之传。^⑩此处仅谓“为之传”,并没有列出具体的传名,《艺文志》则称:

殷、周之际,紂在上位,逆天暴物,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,天人之占可得而効,于是重易六爻,作上下篇。孔氏为之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之属十篇。^⑪

比较马、班的记载,前者未列出《易传》之数,后者则明确指出《易传》有十篇,二人均未提及《杂卦》,至于《序卦》则有争议。前人既多信从孔子作《十翼》之说,对于马、班叙事之出入并未特别留意。晚清以下,学者对《易传》作者有所怀疑,详考文献,因而对于《史记》提出不同的解读,如司马迁是否确指《易传》为孔子所作,其所见《易传》篇数为何,所见《易传》内容与班固所见是否相同等,均牵涉到《易传》的著成时代与作者问题,而《孔子世家》“晚而喜《易》”一段便成了聚讼之所。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易》类著作,谓:

《易经》十二篇,施、孟、梁丘三家。^⑫颜师古(581—645)注:

上下《经》及《十翼》,故十二篇。

由此可推言十篇《易传》的性质虽为“传”,实具有“经”的地位,并由朝廷立于学官,故以《易传》为孔子所作当是汉代学者的共识,并非司马迁一家之言。唐代孔颖达(574—648)谓:“《彖》、《象》等《十翼》之辞,以为孔子所作,先儒更无异论。”^⑬直到清代,大部分学者都接受此说。

三、宋代学者的怀疑

北宋欧阳修首先对孔子作《易传》之说提出质疑。欧阳修撰《易童子问》,借童子之间发挥自己对《周易》经传的诠释,并主张《易传》非皆为孔子所作。《易童子问》卷一开篇即谓:

童子问曰:“‘乾,元、亨、利、贞。’何谓也?”曰:“众辞淆乱,质诸圣。《彖》者,圣人之言也。”童子曰:“然则乾无四德,而《文言》非圣人之书乎?”曰:“是鲁穆姜之言也,在襄公之九年。”^⑭童子问欧阳修“乾”卦卦辞应该如何解释,欧阳修答复道:唯有《彖传》才是圣人孔子之说,故释《易经》应以《彖传》为主^⑮,不可从《文言》。卷三又进一步提出论据:穆姜时代早于孔子,如果《文言》为孔子所作,传《春秋》之《左传》绝不可能把孔子论“乾”卦之言记作穆姜述“随”之语,左氏既述之而不疑,可见其并不以《文言》为孔子所作,当是《文言》袭用了《左传》襄公九年穆姜之语,故可推论《文言》作者非孔子^⑯。欧阳修又将对《文言》之疑推及他传:

童子问曰:“《系辞》非圣人之作乎?”曰:“何独《系辞》焉,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而下,皆非圣人之作,而众说淆乱,亦非一人之言也。昔之学《易》者,杂取以资其讲说,而说非一家,是以或同或异,或是或非,其择而不精,至使害经而惑世也。然有附托圣经,其传已久,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。”^⑰

欧阳修认定《系辞》上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六篇皆非孔子所作,亦即只有《彖传》上下、《象传》上下四篇出于孔子之手。他之所以如此断定,是因为《系辞》诸篇文辞“繁衍丛

脞”，说法“自相乖戾”。“繁衍丛脞”指各传文句时有重复之处，违反了孔子言简义深的写作原则：

谓其说出于诸家，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，故择之不精，则不足怪也。谓其说出于一人，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。其遂以为圣人之作，则又大缪矣。孔子之文章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是已，其言愈简，其义愈深。吾不知圣人之作，繁衍丛脞之如此也。^⑩

在欧阳修看来，《彖》、《象》言简义深，近于《春秋》，可定为孔子之作，至于其他诸篇，反复碎乱，当出于众人之手。而“自相乖戾”则指《易传》的若干论点有所矛盾，欧阳修举二例以证：一、《文言》以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为乾之四德，却又谓“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。利贞者，性情也”，则“元”、“亨”、“利贞”应属三种不同的层次，不可谓之“四德”。二、论八卦起源，《系辞》已有两说：一是八卦出于河图，一是伏羲近取诸身、远取诸物而画八卦；《说卦》又谓圣人幽赞神明而生蓍、观变于阴阳而立卦。三种说法彼此抵牾，不合情理，可见诸传非成于一人之手，更不可能是孔子所作。

除从文辞不一推断外，欧阳修在《易童子问》最末尝试从思想上进行论证。如《系辞》中“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”、“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”之语，与《论语》所记孔子思想不合，故可判定绝非孔子之言。又如“知者观乎彖辞，则思过半矣”、“八卦以象告，爻象以情言”等说法，过于浅陋，亦非圣人当言。至于以“乾”、“坤”之策“三百有六十，当期之日”，不知“乾”、“坤”无定策，完全不明占筮之理，更可见《系辞》非孔子所作^⑪。而就《说卦》、《杂卦》两传的内容来看，应是“筮人之占书”^⑫。

欧阳修虽疑《系辞》以下六篇非孔子所作，但他认为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中可能保存了部分孔子之言。如《易或问》谓：

或问曰：今之所谓《系辞》者，果非圣人之书乎？曰：是讲师之传，谓之“大传”。其源盖出于孔子，而相传于《易》师也。其来也远，其传也

多，其间转失而增加者，不足怪也。故有圣人之言焉，有非圣人之言焉。其曰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其有忧患乎？”“其文王与紂之事欤？”“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欤？”若此者，圣人之言也，由之可以见《易》者也。“河出图，洛出书”，“圣人幽赞神明而生蓍，两仪生四象”，若此者非圣人之言，凡学之不通者，惑此者也。知此，然后知《易》矣。^⑬

欧阳修指出《系辞》中确有孔子对《易》的说解，但这些说解经由“口传”保存下来，而非“著作”的型态。在由“口传”落实到具体“著作”的过程中，混入了后儒说解，非尽为孔子之言。这就牵涉到传世的《十翼》是否为先秦之旧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谓：

及秦燔书，而《易》为筮卜之事，传者不绝。^⑭

后之学者多据此认定《易传》十篇即先秦原貌。但扬雄《法言·问神》曰“《易》损其一”^⑮，王充《论衡·谢短》、《正说》记宣帝时曾得逸《易》一篇^⑯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则曰：

及秦焚书，《周易》独以卜筮得存，唯失《说卦》三篇。^⑰

诸家记载虽略有出入^⑱，然皆谓《易》之诸传或曾散佚。欧阳修在《传易图序》中即认定“《易》非完书”：

说者言当秦焚书时，《易》以卜筮得独不焚。其后汉兴，他书虽出，皆多残缺，而《易经》以故独完。然如《经解》所引，考于今《易》亡之，岂今《易》亦有亡者邪，是亦不得为完书也。^⑲

“《经解》所引”指《礼记·经解》：“《易》曰：‘君子慎始，差若毫釐，缪以千里。’此之谓也。”^⑳此句既非《易》之经文，则当为“传”语，然并未见载于《十翼》，欧阳修据此推论《易》之“传”曾遭秦火而不全。并据《论语》“子曰”的使用，推论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诸篇中既有“子曰”，绝非孔子自作，当是汉代经师引述孔子之语：

盖汉之《易》师，择取其文以解卦体，至其有所不取，则文断而不属，故以“子曰”起之也。其先言“何谓”而后言“子曰”者，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，取卦辞以为答也，亦如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

传《春秋》，先言“何”、“曷”，而后道其师之所传以为传也。今《上系》凡有“子曰”者，亦皆讲师之说也。然则今《易》皆出乎讲师临时之说矣。幸而讲师所引者，得载于篇，不幸其不及引者，其亡岂不多邪？^②

欧阳修认为孔子可能曾作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等传，著于竹帛者因秦火而有散佚，口授之学则相传不绝，然汉经师却只视讲授需要，以“子曰”片段地称引孔子之言，自行发挥，多有谬误，故叹道：

呜呼！历弟子之相传，经讲师之去取，不徒存者不完，而其伪谬之失，其可究邪！^③

可知欧阳修考辨《易传》作者问题，并非完全否定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诸传的价值，而是因为《易传》相传为孔子所作，具有“经”的地位，学者若将所有内容都视为圣人之言而奉行不渝，可能有害。他在《易童子问》中，主张应将《系辞》与《书》、《礼》之“传”同等视之，欲学者“取其是而舍其非”，才能避免“害经惑世”之弊。^④

而欧阳修之所以敢于怀疑《易传》作者非孔子，乃因其有掌握圣人之意的自信。《易童子问》曰：

明智之士，或贪其杂博之辩，溺其富丽之辞，或以为辩疑是正，君子所慎，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。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，邈然远出于诸儒之后，而学无师授之传，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，以圣人之经尚在，可以质也。^⑤

虽然前人对于经传已进行过诸多研究，欧阳修仅是自学所得，但这都不妨碍他由读经直探圣人之志。当《系辞》以下诸传所言，与自身所体会、所理解的圣人似有不同，他便自信地提出自己的疑问，再从各种角度加以考察、证明，开宋代疑《易传》风气之先。而由欧阳修批评《说卦》、《杂卦》为筮人占书，绝非圣人之作，亦可知王弼(226—249)扫除象数之后，经由数代学者阐发义理，《易》的卜筮性质已渐为学者所轻，甚至将卜筮视为对《易》的曲解，故《易传》言及卜筮之处多为欧阳修所斥。

欧阳修断言《易传》非圣人之书，对后来的

学者造成相当大的影响。叶国良在《宋人疑经改经考》中指出：自欧阳修疑《易传》后，北宋司马光(1019—1086)、刘安世(1048—1125)等七位学者继起考订《十翼》之作者；南宋时期，疑《易传》者竟有郑樵(1104—1162)、杨简(1141—1226)、叶适(1150—1223)、王柏(1197—1274)、金履祥(1232—1303)等二十家之说。叶国良比较两宋学者考辨《易传》之差异，指出：

欧阳修虽疑《十翼》有非孔子作者，未及《彖》、《象》；而南宋学者则有以为皆非孔子作者。北宋学者之疑《十翼》，未有以为非先秦古书，南宋学者则有直指其中杂有汉儒伪窜者。^⑥他并归纳两宋学者所运用之考辨方法大致有以下六种：

观宋儒之考《易》，或以各篇思想之矛盾以推其不成于一人之手(原注：如欧阳修之于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以下诸篇)，或以义理之不合以定其非圣人之言(原注：如杨简之于《系辞》)，或以文体之相似以推其著成时代(原注：如李心传之于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)，或以所用词汇之晚以疑其为后人伪窜(原注：如徐总干之于《系辞》下)，或以未见古籍征引以定其书出之晚(原注：如郑樵之于《彖》、《象》)，或以其书出之迟疑为后人所托(原注：如赵汝楨之于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)，可谓勤于思索矣。^⑦

叶国良此处仅其举大者言之，而宋儒在实际进行论证时，往往交互运用以证成其说。这些方法也给予后世研究者相当大的启发。

要而言之，自欧阳修以降，儒者之所以疑《易传》作者，甚至疑及群经，目的在于恢复经典原貌，彰明圣人之志，以期振兴儒学。虽然这些论证或较为疏陋，或过于主观，尚不足以撼动主流意见，但他们敢于怀疑“圣人之言”，已埋下后世考辨《易传》作者的种子。

四、清代学者的考辨

宋代学者对于《易传》作者所提出的种种质疑，并未动摇孔子作《易传》之说，自元以降，对

此一问题的讨论甚少,亦未能超出宋人所言。直到清代崔述撰作《考信录》,才又对《易传》作者问题提出更深入的考辨。此前时代略早于崔述的章学诚(1738—1801)已从校雠学的角度切入,对古代学术流传方式提出新的观点,并对“孔子作《易传》”提出了新的理解,值得注意。而晚清康有为(1858—1927)则主张孔子作《六经》以改制,《易》之卦爻辞与《彖》、《象》二传为孔子所作,《系辞》以下六传或为后儒附会,或为刘歆(约 58B. C. — A. D. 23)窜伪,其说影响二十世纪初古史辨运动甚巨。

章学诚论文献校雠所反映之学术源流,最主要在于:学术之兴,是以庶民的生活需要作为起点,治民的圣人了解决人口渐增、文明演进的需要,新的政治制度应运而生。其后为了经世,将新制度一一纪录下来而成为《六经》。由此一学说,带出了“六经皆先王之政典”,私人著述兴起于战国而大盛于后世的“先公而后私”之论点。《文史通义·言公上》开篇即指出:

古人之言,所以为公也,未尝矜于文辞,而私据为己有也。志期于道,言以明志,文以足言,其道果明于天下,而所志无不申,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所有也。^⑤

古人立言旨在有裨世道,而非标榜个人,此即“言公”。又谓:

古人先有口耳之授,而后著之竹帛焉,非如后人作经义,苟欲名家,必以著述为功也。^⑥

后人多欲托著述来建立个人声名,然古人讲授的目的则在于传布知识,最初并无严格的“作者”观念。以《易》来说:

商瞿受《易》于夫子,其后五传而至田何。施、孟、梁邱,皆田何之弟子也。然自田何而上,未尝有书,则三家之《易》,著于《艺文》,皆悉本田何以上口耳之学也。^⑦

章学诚认为自商瞿至田何,孔门《易》说多以口耳相传,到了施雠、孟喜、梁丘贺之时才写定。而三家所传述之《易》,集结了数代儒者对于《易》的说解,并非个人著作。《十翼》的情况正类此。若以后世“作者”的观念来说,《十翼》当

然不可定为孔子所作,但若将“作者”的观念由“个人”转为“家学”,那么儒者传述孔子之说,加以阐发,自亦不妨以孔子为《易传》之作者:

古人不著书,其言未尝不传。……门人弟子,据引称述,杂见传记章表者,不尽出于所传之书也,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师说。则诸儒著述成书之外,别有微言绪论,口授其徒,而学者神明其意,推衍变化,著于文辞,不复辨为师之所诏,与夫徒之所衍也。而人之观之者,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,不复辨其孰为师说,孰为徒说也。盖取足以通其经而传其学,而口耳竹帛,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。^⑧

简言之,即是“言论为公器”。师徒授受,无论是传于口耳或托于竹帛,均在阐发一家一派之学说,并没有“师之论说”与“徒之论说”的区分。且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,今日所见之书,可能只是某人部分的观点而已。以孔子为例,后人多以《论语》作为了解其中心思想的依据,但《论语》并不代表孔子学说的全部。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,孔子可能对《易经》有所发挥,这些内容虽未见载于《论语》,然经由门人弟子传述,仍有部分被保存了下来。后儒在传述时或添入了个人意见,但其核心仍本于孔子对《易》的诠释,师徒前后论说有何异同,是不须要被揭示的。这是先秦时期的普遍现象。以此观之,《易经》本是先王政典,孔子整齐《六经》,阐发圣王的经典大业,《十翼》源自孔子所教,当然就不是独立创作,而是孔子及其后儒者的集体成果。而《易传》之所以杂糅后来讲师之问答与衍释,也就不能遽尔认定为非毁圣经,应从“言公”的角度,视为尚未有私人著述时,不得不然的一种正常现象。这和后世私人著述观念兴起以后,作伪者有意伪托,是截然不同的。

至于崔述《考信录》则是以欧阳修之说为基础,对《易传》作者提出质疑。《考信录》和《易童子问》最大的不同,在于欧阳修只简单提出了怀疑的理由,并未具体论证,而崔述除提出了怀疑的理由,甚至对于怀疑的方法、怀疑的步骤和限制等,均有详细的说明^⑨。

崔述在《丰镐考信录》卷二“存疑”条引《易》“明夷”《彖传》“内文明而外柔顺,以蒙大难,文王以之”:

文王之在厄,《诗》不言,《书》不言,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亦无言之者,至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传始言之;《战国策》、《尚书大传》、《史记》以降,言之者更多。何邪?谓实无是事邪,何以传记言之者累累;谓果有是事邪,《六经》、《孟子》不当皆讳之而不言。……窃疑文王固尝见忌于纣,纣欲伐之而甘心焉;而文王不肯举兵相抗,委曲退让以承顺之,如太王之事獯鬻,勾践之事吴然者,而后之人递加附会,各以其意而为之说,是以纷纷不一。……余宁从《经》而缺之,不敢从《传》而妄言也。《易传》本非孔子所作,乃战国时所撰,是以汲冢《周易》有《阴阳篇》而无《十翼》,其明验也。^⑩

此条先叙孔子厄于陈蔡之事虽见载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但后人仍多所附会,进而论及《易传》“以蒙大难,文王以之”之说,既未载于《六经》,《论》、《孟》亦无传述,诸家对此事之记叙又不尽相同,可见亦是后人所附会,崔述据此推论“《易传》本非孔子所作”。此一观点,崔述在《洙泗考信录》卷三讨论《论语》“子曰‘加我数年,五十以学《易》,可以无大过矣’”条有更重要而详细的辨析:

《世家》云: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,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。”由是班固以来诸儒之说《易》者,皆谓《传》为孔子所作。至于唐宋,咸承其说。^⑪

以上起首一段文字下,有一大段按语。崔述举出七个证据,证明《易传》非孔子作:

第一证:《易传》文辞繁而多文采,和孔子自著的《春秋》甚至孔子门人所辑录的《论语》相去太远,反而近似《左传》和《大戴礼记》。

第二证:《易传》中有“子曰”二字,显见非孔子所撰。

第三证:孟子(372—289B. C.)不曾提到孔子传《易》之事。

第四证:魏文侯师子夏,但汲冢竹书中的

《周易》无《十翼》,足证《易传》不出于孔子。

第五证:《春秋》襄九年《左传》穆姜答史之言一段与今本“乾”卦《文言传》文字大致相同。而崔述认为《左传》是原创,《文言》则是复制品^⑫。

第六证:《周易》“艮”卦《象传》“君子思不出其位”一语,《论语》既载此语为曾子所说,可推论作传者必非孔子。

第七证讨论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,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”。崔述依据《史记》文例,论证“序”为“序述”之义而非指《序卦传》,然若以“序《书传》”之例来理解“序《易传》”,则又似与后人认定的“作《易传》”有所出入,由于文义不明,故不载《世家》之言^⑬。

以上七证,首二证依《易传》本文推论,最为重要。第三、四证以其他文献记载推论,属于旁证。第五、六证属文献比较之例(《周易》与《左传》、《周易》与《论语》)。第七证则澄清《史记》实未明言孔子撰著《易传》。七证中第一、二、五证是在欧阳修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说,其余四证则属崔述的创发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、四证。崔述指出:子夏在孔门弟子中以“文学”称,然不传《易》;而亟称孔子的孟子,只言孔子之《春秋》学而不言其《易》学,如此,不仅孔子是否撰作《易传》成问题,孔子与《易》学的关系似乎也可以打上问号。到了古史辨时期,许多学者便在其基础上,进而主张孔子未曾读《易》,彻底切断了孔子与《易》之关系,这恐怕是崔述始料未及的。而崔述《考信录》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,影响有限,直到胡适(1891—1962)、顾颉刚(1893—1980)等人表彰其人其书,才引起学界注意。

崔述之后,康有为也对《易传》作者提出怀疑。康有为在《新学伪经考》中主张《易》卦爻辞非文王所撰,而是孔子所作^⑭。在《易传》的问题上,除《彖》、《象》成于孔子之手,其他皆为后人所撰甚至有意伪托。

康有为主张秦焚书并未及于《六经》,故汉

初立于学官的《六经》，皆是完整之书。西汉末年，刘歆为了替王莽政权寻找经典依据，因而窜伪《六经》，淆乱圣人之言。康有为根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指出：西汉时《易》实只有上下二篇，“十翼”之名乃是刘歆所伪，目的在于将自己伪作的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诸传混入。为免启人疑窦，刘歆又在《史记》中窜入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”一段^⑧，将卦爻辞的作者由孔子改为文王，再伪造孔子作《易传》之说，以便将汉儒及刘歆自撰的“易传”，一并附会为孔子之言，藉以取得“经”的地位。康有为除据《法言》、《论衡》，推定“西汉前《易》无《说卦》”，又据思想内容加以论断：

《说卦》：“帝出乎震，齐乎巽，相见乎离，致役乎坤，说言乎兑，战乎乾，劳乎坎，成言乎艮。”又曰：“震，东方也；离也者，南方之卦也；兑，正秋也；坎者，正北方之卦也。”与焦、京《卦气图》合，盖宣帝时说《易》者附之入经，田何、丁宽之传无之也。^⑨

由于焦延寿、京房时代晚于司马迁，康有为据此推定《孔子世家》中的“说卦”二字为后人所窜入。而《史记》中并无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之名，则二传当为刘歆所伪^⑩。又谓：

《说卦》与孟、京《卦气图》合，其出汉时伪托无疑。《序卦》肤浅，《杂卦》则言训诂，此则歆所伪窜。^⑪

康有为指《序卦》“肤浅”、《杂卦》“言训诂”，是从文体与文义分析其非圣经，此与欧阳修批评部分《易传》“繁衍丛脞”是一致的，但他进一步认定二传为刘歆所伪，不免过于武断^⑫。康有为之说予古史辨学者相当大的启发：前人虽疑《易传》非孔子作，仍多认定是孔子身后师儒相传之说，约在战国末年到汉初时写定。康有为则将部分《易传》的成书时代定得更晚，甚至认为是经师或刘歆所编造，与《易经》未必有关联。古史辨时期的学者受其影响，往往将《易传》的年代定得极晚^⑬，又或认定《易传》乃儒者用以寄托己说，与经的关系极浅^⑭。康有为与古史辨学者之预设心理虽有异（前者欲证成其刘歆造伪经

之说，后者则出于反传统及科学主义思潮的思想），但对于《易传》经典性（canonicity）和历史性（historicity）的摧破则是一致的。

综上所述，清代学者对于《易传》作者问题的讨论与宋儒是有若干共同基础，也反映了一些方法论的问题。首先，他们都运用了文献考证的方法，包括分析文辞风格是否符合孔子所撰著的《春秋》（当然他们都预设了《春秋》是孔子所撰），思想内容是否符合《论语》所载之孔子言论。他们也针对《易传》论点或记载的矛盾提出质疑。不过这些考证，其实是从极严格的证据法则去揭示文献纪录的矛盾。如欧阳修论“乾”《文言》抄了《左传》襄公九年穆姜释“随”卦卦辞之语，论证精彩；但他批评《系辞传》论八卦起源有两说之矛盾时，则明显忽略了《易》是《六经》中多义性（diversities）最显著的经典^⑮。《系辞》和其他《易传》解释存在多义性的《易经》，其自身亦存在“诠释多义性”（diversities in interpretations），如《系辞》诠释“益”卦亦有二说，一是观象制器说的“包牺氏没，神农氏作，斲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盖取诸益”^⑯，另一是本于“德”的观念而提出的“德之裕也”、“长裕而不设”、“益以兴利”的衍德说^⑰。且《系辞》谓“河出图、洛出书”，作者原意是否如后儒所释的指龙马负八卦之图以出河，已不能确定，“河出图”一语亦未必与伏羲画卦之说抵触^⑱。崔述的考证也采用了非常严格的标准，如以魏文侯师子夏而汲冢竹书无《十翼》证孔子未撰著《易传》，然除非可以证明汲冢竹书确实尽存子夏所传孔子所授之典籍，绝无遗漏，否则此一论证恐怕仍有讨论的余地。我们提出上述的质疑，并不在为《易传》作者问题翻案，亦不是要论证孔子撰著《易传》，而是希望后世学者能客观理解：欧阳修与崔述采用严格的标准审视文献与证据，并不是毫无商榷余地的。

至于历史学家章学诚从文化演进的角度，并基于“六经皆史”说的经世思想，将《易传》视为师徒之说相承、家派论点融合的产物，此说其实是被众多攻讦《易传》的学者所忽略，却是我

们讨论《易传》问题时所不能不注意和考虑的论点。学者必须注意:包括欧阳修、崔述和康有为的考辨目的,都不在于推翻儒家经典,而是在儒学净化运动的潮流中,秉持着强烈的正统意识,极力清除儒学中的杂质^⑤,以彰明圣人之道。这是研究者必须特别留意的。如果撇开儒学信仰的神圣性不论,《礼记》利用“子曰”来发挥孔子及其后学的思想,其诠释广为后世儒者所接受,唐代编修《五经正义》便将其列为“经”;《易传》亦利用“子曰”以将孔子学说融入卦爻德义的解释,又有何道理非要将其逐出“经”之行列?

五、古史辨学者的论难

晚清以降,西学大量传入,对于学者研究传统学术的视角与方法都造成重大冲击。《易经》本涉及殷周“古史”,而二十世纪初随着引进社会学方法和观念的“新史学”在中国本土扎根,在以“史”治《易》的风气下,社会学观点和方法遂被广泛地引入《周易》经传的研究,造成巨大的影响。西方社会学者经由考察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,推导出各种公理、公例,再用以解释所有民族的文化现象,而以“进化史观”影响最大。“进化史观”主张人类社会文明是逐渐发展而成的,其初莫不以巫术迷信、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统治。既是人类社会的公理、公例,中国社会必然也经历过这些阶段。于是学者们戴上新学说的眼镜,重新检视古籍,指出《易经》言卜筮,正是“神道设教”的代表,“义理”则是后人为了推崇圣经而披上的外衣,故致力于恢复《易经》的“卜筮”原貌。而对《易经》看法的转变,也让研究者对于《易传》作者问题有了不同的思考角度。大体来说,此时期学者多主张《易传》非孔子作、非成于一人之手,还提出了一个新问题:孔子是否读过《易》?此一问题牵涉到《易传》中是否保存了孔子思想,是否确为儒者之说,于是《易传》的思想归属又成了必须厘清的新课题。

钱玄同(1887—1939)在1923年所撰《答顾

颉刚先生书》中,畅谈对群经之疑。他认为《论语》是考察孔子学说和事迹最可信的依据,故将其中有关《六经》之处摘录下来,加以分析。这种“以经释经”或“以经证经”的方法,清儒已广泛运用了二百余年。信中指出《论语》中提及《易》有三处:其一“五十以学易”,“易”字乃是汉人所改:

《鲁论》与《古论》大异。今本出于郑玄,郑于此节从《古论》读。若《鲁论》则作“五十以学,亦可以无大过矣”(原注:见《经典释文》),汉《高彪碑》“恬虚守约,五十以学”,即从《鲁论》。我以为《论语》原文实是“亦”字,因秦汉以来有“孔子赞《易》”的话,故汉人改“亦”为“易”以图附会。^⑥

其二,《论语》中孔子引“恒”九三爻辞,与赞《易》无关;其三,曾子曰“君子思不出其位”,“艮”卦《象传》作“君子以思不出其位”,乃是《象传》作者袭用曾子之语。由此三处可以确认孔子与《易》无关。钱玄同更提出看待《易经》与《易传》之新观点:

我以为原始的《易》卦,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底东西;“乾”、“坤”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。初演为八,再演为六十四,大家拿它来做卜筮之用;于是有人做上许多卦辞、爻辞,这正和现在底“签诗”一般。……孔丘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底哲理,有做《彖传》的,有做《象传》的,有做《系辞传》的,有做《文言传》的,汉朝又有焦贛、京房一流人做的《说卦传》,不知什么浅人做的《序卦传》,不知那位学究做的《杂卦传》,配成了所谓“十翼”。^⑦

“生殖器崇拜”(phallicism)是人类学家研究原始宗教在古代社会的崇拜行为。《易经》原本已将经验层面的物质世界存在一切雌雄两性、阳刚阴柔的实质事物,化约为阴阳、乾坤、往来、吉凶等抽象观念,以统辖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所代表的具体事物和道理。钱玄同的论点等于否认《易经》存在抽象化的观念,反过来指一切《易》理皆源出于原始社会的生殖器崇拜。“原始”二字,其实蕴涵了一种进化论的观点,认为

中国社会愈古老则愈素朴、文明也愈低。至于“《易》为卜筮之书”的说法,可能受到章太炎(1869—1936)的启发。章太炎反对皮锡瑞(1850—1908)、廖平(1852—1932)、康有为等人将《六经》视为孔子改制之作,强调《六经》为周代施政纪录,绝非孔子为后世制法所创作。章太炎1899年撰《今古文辨义》曰:

《易》与《礼》、《乐》,多出文、周,然《易》在当时,为卜筮所用,《礼》、《乐》亦为祝史瞽蒙之守,其辞与事,夫人而能言之行之也。^⑤

1910年撰《经的大意》一文中则谓:

百年前有个章学诚,说“六经皆史”,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,这句话,真是拨云雾见青天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固然是史,《诗经》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,《礼》、《乐》都是周朝的法制,这不是史,又是甚么东西?惟有《易经》似乎与史不大相关,殊不知,《周礼》有个太卜的官,是掌《周易》的,《易经》原是卜筮的书。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,都算一类,所以《易经》也是史。^⑥其所以强调“《易》为卜筮之书”,旨在阐明《易》为太卜所掌,确为周代政典之一,并非孔子所作。此外,章太炎1913年撰《自述学术次第》,其后修订为《易论》,皆以历史实证观点论述《易》卦取义体系,对古史提出解释^⑦。此种“《易》为卜筮”、“以《易》释史”的观点,可能正启发了钱玄同、顾颉刚^⑧。他们转将“卜筮”与“迷信”结合起来,批判《周易》经文不过是筮诗之流,绝无义理可言,《易经》亦只剩下史料价值。而钱玄同这两段辨析,可说为古史辨时期讨论《周易》经传问题定下基调:《易经》为卜筮之书,孔子与《易》无关;《易传》为孔子后学所作,对于其后学者讨论《易传》作者问题影响深远。

冯友兰(1895—1990)1927年发表《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》,以思想比较的方式探讨《易传》的作者问题:

“易”之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等是否果系孔子所作;此问题,我们但将《彖》、《象》等里面的哲学思想与《论语》里面的比较,便可解决。^⑨

这也是采用了“以经释经”的方法。冯友兰引《论语》与此三传对“天”的观念,加以比较:

《论语》中孔子所说之天,完全系一有意志的上帝,一个“主宰之天”。但“主宰之天”在《易·彖》、《象》等中,没有地位。我们再看《易》中所说之天,……我们读了以后,我们即觉在这些话中,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。……这些话里面的天或乾,不过是一种宇宙力量,至多也不过是一个“义理之天”。^⑩

《易传》中的“天”固然是自然的意味为多,但《论语·阳货》记孔子回答子贡“子如不言,则小子何述焉?”时,答道:“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,天何言哉!”^⑪这个“天”何尝是一“有意志的上帝”?何尝没有自然主义的意味?由此可见,比较《易传》和《论语》(或《春秋》)而论其是否与孔子有关,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。在冯友兰看来,人的思想可以变动,但对宇宙及人生不可能同时有两种极端相反的观念,《论语》与《易传》对“天”的观念既不同,则不可能出於一人之手,因此只能说孔子或曾读《易》,并有所解释,但仅是随时讲解,“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意义”^⑫。此说其实亦承自二十世纪初的思潮,刻意将《易传》和孔子切割,并有意无意地贬低《易传》的价值,暗示其思想另有来源。而此种由观念辨析思想异同的方式,后来广为学者所接受及运用。

其后钱穆(1895—1990)在1928—1929年间发表《论十翼非孔子作》一文^⑬。该文提出十个证据,证明孔子未尝撰《易传》:

第一证:汲冢竹书无《十翼》。

第二证:《左传》穆姜论元亨利贞与“乾”卦《文言》同,以文势论,是《文言》抄了《左传》。

第三证:《易》“艮”卦《象传》“君子思不出其位”一语,《论语》记曾子语。若孔子作《十翼》,则《论语》编者不应如此记。

第四证:《系辞》屡称“子曰”,显非孔子所撰。

第五证: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引《系辞》称《易大传》而不称经,可见太史公不以之为孔子

之语。

第六证:太史公尊崇孔子,多称述孔子所称述的远古贤哲。今《系辞》详述伏羲、神农,但《史记》称五帝托始黄帝,更不叙及伏、神二氏,可证史公时尚不以《系辞》为孔子作品。

钱穆谓此六证前人多说过。如第二、四证欧阳修、崔述皆已言之,第一、三证见于《考信录》。第五证之意康有为曾言及^⑧,第六证则是前人讨论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何以无伏羲、神农时,用以批评司马迁不从经典之过,但钱穆将第五、六证转用于推论司马迁并不以《系辞》为孔子所作,则是其个人创发^⑨。虽已有六证,但钱穆仍觉不足以击中问题核心,唯有切断孔子与《易》的关系,才能彻底解决此一争议:

现在要更进一层说,孔子对于《易经》也并未有“韦编三绝”的精深研究,那孔子作《十翼》的话自然无根据了。^⑩

钱穆又举出四证加以说明:

第七证:《论语》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”一条,《鲁论》“易”作“亦”,本很明白;《古论》妄错一字,遂生附会。

第八证:《孟子》常称述《诗》、《书》而不及《易》。《系辞》有“继之者善,成之者性”,孟子论性善亦不引及。又荀子亦不讲《易》。^⑪

第九证:若孔子曾作《十翼》,《易》为儒家经典,秦人焚书必及之。既然秦不烧《易》,可知《易》在先秦必非儒家经典。而今日所见《易传》多为儒家学说,是秦后儒者将思想学问托于《易》,而非传述儒家旧说。

第十证:《论语》和《易》思想不同。此条比较了《论语》与《系辞》论“道”、“天”、“鬼神”之处,指出《系辞》思想近老庄,其哲学是道家的自然哲学。

此第七到九证,层层推进。先论孔子无学《易》之事,次论孟、荀两大儒者皆不言《易》,截断先秦儒家与《易》的关系(此证部分《考信录》曾提及,但钱说更详细)。接着补充秦焚书不及《易》以加强史实,最后则回到思想史上,从观念的分析比较着手。钱穆集结了前人对于《易传》

考辨的重要论证,据此十证,孔子不仅与《易传》无关,与《易经》也无关了。钱穆所提十证多为同时期的学者所接受^⑫,即使不接受其说,在讨论《易传》作者与时代问题时,亦必须先说明孔子、先秦儒者与《周易》经传之关系,才能展开论述。尤其第十证的提出,让学者开始留意到先秦各家思想的互动。

顾颉刚于1930年所撰《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》一文,在概念上提出“故事”二字以扣紧“辨古史”的前提,方法上则从文献比较着手。他注意到《系辞》“观象制器”章、《世本》、《淮南子》都陈述圣人制器之事,若《系辞》确为孔子所作,时代较早,又是圣人之言,《世本》、《淮南子》应直接称引,但《世本》内容与《系辞》不同,而《淮南子》虽与《系辞》相近,文中却未明言引自《系辞》,则《系辞》的撰作时间可能反在《淮南子》之后,加以《史记》亦未引用此章,可知其时代应更晚。至于“观象制器说”称一切的物质文明都发源于《易》卦,立论除了直观卦象,还运用到互体、卦变等繁复的方式,实奠基于《说卦》、《九家易》上,故可推言应是京房或京房后学所作,时代不能早于汉元帝^⑬。顾颉刚一方面受康有为所影响,认为“互体”、“卦变”之说荒诞,又未见于先秦,当为汉人所创;一方面则采钱穆之说,由《史记》不言神农、伏羲推论司马迁未见《系辞》;又得力于崔述比较《论语》与《象传》“君子思不出其位”的方式,故将《系辞》“观象制器”一章定为西汉后期所作,而此种以文献所载内容相近,推定彼此先后顺序的作法,其后也常被学者用于考证《易传》各篇之撰作时代。

李镜池(1902—1975)在1930年与顾颉刚讨论《易传》而作《论易传》著作时代书,文中指出:《彖》、《象》大约成于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间,《系辞》则从汉初直到西汉末。又谓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实是西汉时代一班易学家说《易》遗著的汇录,他称之为“杂拌”^⑭。同年另撰《〈易传〉探源》,进一步论证《易传》各篇的时代与作者问题。他先由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不见“十翼”之名,推言当时“孔子作《十翼》”之传说尚未固定

下来,再由篇中“孔子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乐教”一句,推言孔子未尝以《易》教人,故孔子以《六经》为教,是西汉才有的说法。再者,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”一段文字,与上下文无关,若非错简,则必定是后人所插入。约在昭、宣之间始有孔子“序”《易传》之说,新莽时刘歆进一步将“序”改为“作”,可见这种传说实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成。此说或即受康有为之影响而来。李镜池在两文中又尝试将《易传》各篇分开来讨论,有助于学者对各传性质、时代进行辨析。如其中谈到《彖》、《象》与儒家的关系:

如果我们读过了儒家底一部重要的书——《论语》,再来读《象传》,就仿佛在温习旧书一般,很熟识,很了解。《象传》这些话,差不多从《论语》里头都可以找出它相类似的话来。^⑤

不特《象传》是儒家思想的产物,就是《彖传》也带儒家色彩。……不过《彖传》作者并不是纯粹的儒家,……多多少少是受道家底影响。^⑥

前文引冯友兰辨“天”观念而谓《彖》、《象》与《论语》不类,而李镜池从政治、人生哲学切入,主张《象》与《论语》相近,而《彖》则杂有道家影响,进而推论两传作者不同。

在否定《周易》经传与孔子关系的阵营中,郭沫若(1892—1978)的观点较为特殊。他在1928年所撰《〈周易〉时代的社会生活》,赞成文王演《易》、孔子读《易》的传统说法,然1935年撰《〈周易〉之制作时代》则据《鲁论》否定孔子与《易经》之关系,并将《易经》作者定为战国时的儒者鬻臂子弓^⑦,如此一来,“《易传》的‘十翼’不作于孔子,是不待论的”^⑧。但他并不赞同《易传》皆是秦汉之后才作成,因为据《晋书·束皙传》所记,汲冢出土已有“似《说卦》而异”的《卦下易经》,可推知战国初年鬻臂子弓传授《易》时,必然有过类似“传”的东西以说明自己的理念,只是弟子们所记内容有所出入,故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三篇,可能与《卦下易经》都是同类的作品。《彖传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三种当是荀子门人在秦统治期间所作,至于《象

传》则从李镜池之说,定为秦汉之际的北方儒者模仿《彖传》而成^⑨。郭沫若将《易经》的著成时代定在战国,证诸文献与文物皆难以成立^⑩,但值得注意的是:他认为《易经》中有丰富深厚的哲理思想,并不只是卜筮之书,而周人在太王时“还是穴居野处的原始民族”,文王也只是“半开化民族的首长”,绝非“能够作出《易经》来的那样高度的文化人”^⑪(读者可特别注意“穴居野处的原始民族”、“半开化民族”二语),为了调和此一矛盾,故将《易经》的时代定得极晚。以往学者多因《说卦》以下三篇而怀疑《易传》作者,但郭沫若却认为这三篇实与《周易》的关系最为紧密。此外,他在李镜池的基础上,据地域学风将《易传》的作者区分开来,又将《彖传》、《系辞》与《荀子》相较,指出《易传》多出荀门,推言传《周易》经传者应为荀子一系,对于后人讨论《易传》的思想归属颇有影响。

在此种怀疑风潮下,学者们多主张“《易》为卜筮之书”,也改从另一种角度肯定《易传》的价值,梁启超(1873—1929)可为代表。梁启超在1927年讲授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时便指出:

《易》的本身原无哲学意味,不过是卜筮的书。……后人思想进化,拿来加上哲学的色味,陆续做出了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等篇,不幸《史记》有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”的话,以后的人便把带哲学意味的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和乱七八糟的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都送给了孔子。^⑫

其说虽未否认《彖》、《象》可能与孔子有关,然将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中的“阴阳”观念与邹衍相联系,又将“玄学”、“鬼神死生”与道家相联系,主张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以下各篇当是“孔门后学受了道家和阴阳家的影响而做的书”^⑬。而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虽非孔子所作,但其中有许多精微之语,是古代哲学的重要成果,不必否定其价值:

我们应该把画卦归之上古。重卦、做卦辞爻辞,归之周初,做《彖辞》、《象辞》,暂归之孔子。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归之战国末年,《说卦》、

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归之战国秦汉之间,拿来观察各时代的心理、宇宙观和人生观,那便什么都有价值了。^④

梁启超虽不因《易传》非孔子作而轻视之,然只将其视为考察时代思想的材料,切断了经传的纵向联系,也影响了近一世纪以来“经传分离”的研究取向。

苏渊雷(1908—1995)于1933年所撰《易学会通》一书中,虽接受文王于忧患中作《易》之旧说^⑤,但也采用卦爻辞为农业社会初期产物,尚未脱离卜筮之用的新见^⑥。他推崇孔子赞《易》“始推天行以明人事”,并从“孔子对于宇宙之观念”、“孔子之力行主义”及“正名主义”三方面,证明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所言与《论语》相合,确立孔子与《易》学之渊源,故将《易传》归于孔门,并无不宜^⑦。苏渊雷从思想比较,证明《易传》与孔子确有关系,然他赞扬孔子能“推天行以明人事”,则似认定《易传》的义理全为孔子所创发,与《易经》无关。

张心澂在1939年所撰《伪书通考》一书中,先整理了历代学者对于《易传》的相关讨论,反驳前人谓孔子与《易》无关之说,再进而分析孔子与《周易》经传之关系。张心澂认为孔子曾经整理卦爻辞,此即司马迁所言“序彖系象”,而“说卦文言”指的则是作《彖》、《象》二传,以此调和《史记》记载与“《十翼》非尽出于孔子之手”的歧异^⑧。他特别强调《论语》虽是了解孔子的重要材料,但“究非其全体,不能谓《论语》之外,别无孔子之精深义理”^⑨,故采章学诚之见,以学派传承的观点照看全局,指出非孔子自作之传,可能亦是孔子口授,至汉时方写定^⑩。他又指出“玄学思想”非专属于道家,孔子可能亦有此种思想而不常言,又由南北学风不同切入,推论《系辞》思想之所以颇近于道家言,可能是南方学者较容易领会此类玄思,故发挥较多:

《易》由商瞿传之楚人馯臂子弘,子颢传江东人矫子庸疵,其所以得此传者,殆亦以南人而易领悟此道之故。此二人皆以南人接近南方之玄学思想,更足以发挥光大《易》之玄理。其玄

理与道家固有相同之点,而其为用(原注:即推之人事)则与道家殊涂矣。^⑪

前人比较《易传》与道家思想多就“观念”言,而张心澂则着意于“用”,强调《易传》的要旨在于“人事”,以此判分其当为儒者之言,诚为有见。要之,苏、张二人虽不否定孔子读《易》、赞《易》的旧说,实亦不免受“《易》为卜筮之书”的影响,改从儒学的角度来肯定《易传》的价值。经传的关系又受到另一重打击。

大体而言,此时期学者在研究《易传》相关问题的方法上,结合了清儒文献考据与西方哲学思辨之长,并援引人类学及社会学的观点,较前人更为繁复细密,部分讨论较具说服力。各家在研究方法上的开拓,深化了《易传》研究的各个面向,却也不免以偏概全或是主观之失。以文献考证来说,学者以文献内容比较时代先后,或忽略了古书的著成、流传的过程中,可能有文字上的出入、思想上的取舍,未必适用于全部的文献。而以思想分析来说,学者在比较时态度仍不够严谨,如冯友兰提出“天”的几种意义,但先秦思想家论“天”,义理、主宰、自然等几个范畴常相重叠,勉强区分亦未必有当,故其分析方法似更加严密,实有不少盲点。而之所以产生这些盲点,与学者对《易经》的态度有关。无可置疑,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在维护传统和推翻传统两端之间激烈摆荡,对于《易经》的态度也不免出现保守派与革新派的异同观点(读者可参杨庆中《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》),亦使此一时期对《易传》的讨论常陷入目的论式(teleological)的窠臼。考证倘建筑在某种文化预设与想象的基础上,所得结论很难客观,遂让二十世纪初《周易》经传的讨论,沾染了不少当代政治社会改革思潮的特殊色彩。

而此时怀疑《易传》非孔子所作者,虽多据前人之说,立场并不相同:十九世纪以前,学者多信《易经》为圣人所作,而孔子所作之《易传》当以发挥义理为主,所以主要针对《易传》中论及卜筮之处提出质疑,间亦及于文辞、思想之比较;古史辨时期,学者多认定《易》为卜筮之书,

而孔子为中国人文思想、理性主义的开拓者，不应与卜筮之书有所关联，因此部分学者便主张孔子未曾读《易》，亦曾未以《易》教弟子，先秦儒家并未传《易》学，《易传》乃是秦汉之后儒者因无书可说，不得已而作。这种决绝的态度，一方面切断了《周易》经传关系，另一方面也几乎切断了《易传》与先秦儒学的联系，影响至巨。

【注释】

①马王堆汉墓帛书另有《易传》六种：《系辞传》、《二三子问》、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、《昭力》、《繆和》，与本文讨论历代学者辩论之《易传》作者问题无涉，暂置不论。

②⑬孔颖达《周易正义·卷第一》“第六论夫子十翼”：“其《彖》、《象》等《十翼》之辞，以为孔子所作，先儒更无异论；但数《十翼》亦有多家。既文王《易经》本分为上下二篇，则区域各别，《彖》、《象》释卦，亦当随经而分。故一家数《十翼》云：《上彖》一、《下彖》二、《上象》三、《下象》四、《上系》五、《下系》六、《文言》七、《说卦》八、《序卦》九、《杂卦》十。郑学之徒，并同此说，故今亦依之。”王弼、韩康伯注，孔颖达疏：《周易注疏》，文艺印书馆1997年版，第11页。

③~~88~~~~89~~~~90~~~~91~~张心激:《伪书通考》,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,第41—80页,引文见第40—41、75、79页。

④④黄沛荣：《易学乾坤》，大安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57—210页。关于孔子作《易》之说，该文第157—164页已作整理。文中先引叶国良《宋人疑经改经考》指出：约与欧阳修同时，王洙疑卦辞为孔子作。叶梦得亦有近似的主张。王、叶皆认为依司马迁之言，《系辞》当名“易大传”而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以“系辞”为孔子《十翼》之一篇，应指卦辞而言。至王弼始误改“易大传”之名为“系辞”，实则卦辞、《系辞》皆孔子十翼之一。又补充后人的看法如：南宋李石亦谓卦爻辞似出孔子之手。清人中则有廖平《知圣篇》主张“十翼既非孔子作，则经之为孔子作无疑矣”。可知康有为并非第一个主张卦爻辞为孔子所撰之人。

⑤原刊《台大中文学报》第12期(2000年5月),后转载于《周易研究》2001年第12期(2001年2、5月),又收入《先秦儒道旧义新知录》,大安出版社2004年版,第39—117页。

⑥杨庆中：《周易经传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，第150—171页。

⑦⑨徐威雄：《先秦儒学与易关系之研究》，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，第164—206页。第176页指出后人对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的断句至少有四种说法。

⑧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，第1937—1938页。

⑩⑪⑫②班固：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 1997 年版，第 3589、1075、1073 页。

校：《欧阳修全集》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，第1107、1119—1123页。穆姜之言见《春秋》襄公九年《左传》：“穆姜薨于东宫。始往而筮之，遇艮之八。史曰：‘是谓艮之随。随，其出也。君必速出！’姜曰：‘亡！是于《周易》曰：‘随，元、亨、利、贞，无咎。’元，体之长也；亨，嘉之会也；利，义之和也；贞，事之干也。体仁足以长人，嘉德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然，故不可诬也，是以虽随无咎。今我妇人，而与于乱。固在下位，而有不仁，不可谓元；不靖国家，不可谓亨；作而害身，不可谓利；弃位而姤，不可谓贞。有四德者，随而无咎。我皆无之，岂随也哉？我则取恶，能无咎乎？必死于此，弗得出矣。’”杜预注，孔颖达疏：《春秋左传注疏》卷30，艺文印书馆1997年版，第25—27页。

⑮《易童子问》卷一提到《象传》亦是孔子之说。

②①欧阳修：《易或问》，《欧阳修全集》，第879页。

②③扬雄《法言·问神》：“或曰：易损其一也，虽蠢知阙焉。”扬雄撰，汪荣宝义疏：《法言义疏》中华书局1996年版，第147页。

②④王充《论衡·谢短》：“宣帝之时，河内女子坏老屋，得《易》一篇，名为何《易》？此时《易》具足未？”（王充撰，黄晖校释：《论衡校释》，中华书局1996年版，第559页）《正说》：“至孝宣皇帝之时，河内女子发老屋，得逸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尚书》各一篇。”（第1124页）

②魏征等撰：《隋书》，中华书局 1973 年版，第 912 页。

②扬雄、王充谓所失所得皆为“一篇”，屈万里认为此失而复得之一篇，当为《杂卦》：“《杂卦》一篇，宣帝前既不见征引，乃至无人道及，则是所谓损者，即此一篇，固断断乎无疑也。”然《隋书·经籍志》何以又言“失《说卦》三篇”，屈万里指出：“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，各家多隶属一卷，以其篇幅之简短度之，汉以来当即合作一篇。……《说卦》一名，可括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，合之为一篇，分之为三篇。……《杂卦》既与《说卦》同篇，后人既以《说卦》之名统之，而谓所失者在《说卦》，《隋志》承其说，又见《说卦》为三篇，因而致误，不知实《说卦》中

之一也。”参屈万里《易损其一考》，原刊《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》第1卷第2期(1936年12月)，收入《屈万里先生文存(第一册)》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，第87—91页。

②⑨⑩ 欧阳修：《传易图序》，《欧阳修全集》，第946、947页。

⑪ 郑玄注，孔颖达疏：《礼记注疏》卷50，艺文印书馆1997年版，第6页。

⑫⑬ 叶国良：《宋人疑经改经考》，台湾大学出版社委员会1980年版，第9—10、21页。

⑭⑮⑯⑰ 章学诚撰，叶瑛校注：《文史通义校注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169、172页。

⑱⑲ 郑吉雄：《20世纪初〈周易〉经传分离说的形成》，收入刘大钧主编：《大易集奥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16—223、237—240页。按：本节论崔述及下节论钱穆的部分，主要据该文第二节“崔述对《易传》的怀疑及其影响”而略有增删。

⑳ 崔述：《丰镐考信录》，《考信录》，世界书局1979年版，上册，第12—14页。

㉑②③ 崔述：《洙泗考信录》，《考信录》，世界书局1979年版(下册)第38页。崔述谓：“《春秋》襄九年《传》，穆姜答史之言与今《文言》篇首略同而词小异。以文势论，则于彼处为宜。以文义论，则‘元’即‘首’也，故谓为‘体之长’，不得遂以为‘善之长’。‘会’者‘合’也，故前云‘嘉之会也’，后云‘嘉德足以合礼’，若云‘嘉会足以合礼’，则于文为复，而‘嘉会’二字亦不可解。‘足以长人、合礼、和义，而干事，是以虽随无咎’，今删其下二句而冠‘君子’字于四语之上，则与上下文义了不相蒙。然则是作《传》者采之鲁史而失其义耳，非孔子所为也。”(第39—40页)又谓：“《世家》之文本不分明，或以‘序’为《序卦》，而以前‘序《书传》’之文例之，又似序述之义，初无孔子作《传》之文。盖其说之晦有以启后人之误。故今皆不载。”(第40页)

㉔⑤⑥⑦⑧ 康有为：《新学伪经考》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，第52、35—36页。康有为批评刘歆：“颠倒眩乱，学者传习，熟于心目，无人明其伪窜矣。”(第52页)又谓：“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所出尤后，《史记》不着，盖出刘歆所伪，故其辞闪烁隐约。于《艺文志》着《序卦》，于《儒林传》不着，而以‘十篇’二字总括其间，要之三篇非孔子经文。”(第36页)

㉕ 按：《诗经》有毛亨所撰《大序》、《小序》，《尚书》有百篇《书序》，与《易》之《序卦传》撰著年代可能相近，盖系战国晚年风气的产物。从文体比较角度考察，未必

为汉代晚出之作。

⑩ 如钱玄同在《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》时，便谓：“康氏直断《说卦》为焦京之徒所伪作，宣帝时说《易》者附之入经，可谓巨眼卓识。”(收入顾颉刚编著：《古史辨》第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77页)而顾颉刚则将《系辞》“观象制器”一节的时代定在《史记》之后。又如李镜池《论易传著作时代书》中曾论证《系辞传》撰于西汉，《文言传》则是其中一部分。

⑪ 如钱穆认为《十翼》为秦后儒者所托，非传儒家旧说。

⑫ 《易经》卦爻辞本即有多义性的现象，故一卦之中，六爻可将卦爻作不同意义向度的衍伸。说详郑吉雄：《从卦爻辞字义的演绎论〈易传〉对〈易经〉的诠释》，《汉学研究》第24卷第1期(2006年6月)，后收入《周易玄义诠释》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2年版，第45—98页。

⑬⑭ 《系辞下传》，《周易注疏》卷8，第5页。

⑮ 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：“‘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’者，如郑康成之义，则《春秋纬》云：‘河以通乾出天苞，洛以流坤吐地符。河龙图发，洛龟书感。河图有九篇，洛书有六篇。’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，洛书则九畴是也。”(《周易注疏》卷7，第30页)从文义看来，“河龙图发”既未言此图即是“八卦”，孔安国以为“河图则八卦”亦仅言以八卦为法则，实未与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始作八卦之说，有明显的抵牾。然则欧阳修之质疑，尚未能有愜于人心。

⑯ 关于“儒学净化运动”，详郑吉雄：《乾嘉学者经典诠释的历史背景与观念》，原刊《台大中文学报》第15期(2001年12月)，后收入《戴东原经典诠释的思想史探索》，台湾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29—273页。

⑰⑱ 收入《古史辨》第1册，第75、77页。按：《鲁论》“易”作“亦”，清儒惠棟在《九经古义·论语》中已言及：“‘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’《鲁论》‘易’为‘亦’。君子爱日以学，及时而成，五十以学，斯为晚矣。然秉烛之明，尚可寡过，此圣人之谦辞也。”收入《皇清经解正编》卷374，艺文印书馆1962年版，第3页。而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在1920年所发表《作易年代考》一文，亦曾提到此一问题：“《鲁论语》‘易’字作‘亦’，五十以学，亦可以无大过矣。五十是知命之年，其时若能再学，自今以往，可以无过云云，是谦逊语，而非谓说学《易》也。”译文收于江侠庵译：《先秦经籍考》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，第39—66页，引文见第51页。

⑤⑨汤志钧编:《章太炎政论选集》,中华书局1977年版,第110页。

⑥⑩原载《教育今语杂志》第2册(1910年2月),后载吴齐仁编:《章太炎的白话文》,泰东图书局1927年版,又收入章念驰编订:《章太炎演讲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,第71页。

⑥⑫章太炎与钱玄同有师承关系,《经的大意》收入《章太炎的白话文》,黎锦熙、萧一山等人尝推论《章太炎的白话文》实为钱玄同所作,陈平原在《关于〈章太炎的白话文〉》一文中已加考辨,指出此书除《中国文字略说》为钱玄同所作,其余诸篇当为章氏自作,然由此可见章、钱两人关系之密切。参陈平原:《关于〈章太炎的白话文〉》,《鲁迅研究月刊》2001年第6期。而顾颉刚在《古史辨》第1册的《自序》中,亦曾自述受章太炎之影响与启发:“我愿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,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《六经》,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。”“我当时愿意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,只因听了太炎先生的话。”《古史辨》第1册,第23—26页。

⑥⑭⑮原刊《燕京学报》第2期(1927年12月),后收入《古史辨》第2册,第198—200页。

⑥⑯何晏注,邢昺疏:《论语注疏》卷17,艺文印书馆1997年版,第8页。

⑥⑰⑱按:该文篇首载“(民国)十七年夏在苏州青年会学术演讲会所讲《易经研究》之一部分;刊入《苏中校刊》第十七、八合期;又载十八、六、五,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》第七集,第八十三、四合期”。参《古史辨》第3册,第89、90页。

⑥⑲康有为言:“史迁《太史公自序》称《系辞》为《易大传》,盖《系辞》有‘子曰’,则非出孔子手笔,但为孔门弟子所作,商瞿之徒所传授,故太史谈不以为经而以为传也。”《新学伪经考》,第51页。

⑥⑳按:钱穆“史公尊崇孔子,多称述孔子所称述的远古贤哲”一语亦系一种预设。依其意推之,孔子亦未尝言黄帝事,而《史记》“称五帝托始黄帝”,已可见《史记》

立论未必悉依孔子言论以为标准。今《史记》不言伏羲神农,自亦不能推论司马迁不以《系辞》为孔子所撰著。此亦读者不可不注意之一点。

⑦①钱穆自注曰:“今《荀子》书中有引及《易》的几篇,并不可靠。”

⑦②如郭沫若1928年撰《〈周易〉时代的社会生活》中“《易传》中辩证的观念之展开”一节,持“孔子作《十翼》”说,相信孔子读过《易经》(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,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,第47—48页),但是到了1935年撰《〈周易〉之制作时代》时,便改称“孔子与《易》并无关系”(《青铜时代》,第55页)。

⑦③原刊《燕大月刊》第6卷第3期(1930年10月),收入《古史辨》第3册,第45—69页。

⑦④原作于1930年3月13日,收入《古史辨》第3册,第13页。

⑦⑤⑦⑥原刊《燕京大学史学年报》第2期(1930年11月),收入《古史辨》第3册,第114、116—117页。

⑦⑦⑦⑧⑦⑨郭沫若:《〈周易〉之制作时代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,第60—64、53页。并参李镜池:《〈易传〉探源》,第116页。

⑦⑩关于《易经》年代的问题,屈万里《易卦源于龟卜考》(原刊中央研究院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27本[1956年4月],后收入《书佣论学集》,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,第48—69页)及《周易卦爻辞成于周武王时考》(《书佣论学集》,第7—28页)均有详确的考论。黄沛荣在《老子书与周易经传之关系》一文中曾针对郭说加以辨明,参《易学乾坤》,第217—218页。

⑦⑪⑦⑫梁启超: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,中华书局1936年版,第77—78页。

⑦⑬⑦⑭苏渊雷:《易学会通》,世界书局1935年版,第15、3、9、6—10页。

(编校:章 敏)

百年老刊 • 国学津梁
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

船

山


學

刊

3
2015
復總美97規

CHUANSHAN JOURNAL

船山學刊

趙樣初 

创办于 1915 年 8 月，是中国现存刊出历史最久的学术期刊之一。

编辑委员会

顾问 文选德 郑佳明 唐凯麟

主任 周发源

常务副主任 刘晓敏

副主任 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王兴国 王泽应 刘沛林

委员 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王柏新 石潇纯 刘建武

朱汉民 朱迪光 李建华

学术咨询委员会 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方克立 陈 来 张立文 张学智

杨 明 杨国荣 郭齐勇

主 编 周发源

执行主编 王泽应

责任编辑 龙 凯 余学珍 章 敏 黄渊基

船山學刊

(双月刊)

创办于 1915 年 8 月

•《船山学刊》创刊百年纪念专栏•

民国时期《船山学报》的传播和影响

张晶萍(01)

•船山思想研究•

王夫之“古今之通义”的深刻内涵与价值建构

王泽应(08)

论王夫之士人格思想的人凡超俗向位

李长泰(17)

王夫之与唐甄功利主义思想比较研究

赖井洋(23)

•湖湘文化研究•

新发现的杨开慧三篇短文浅析

李忠泽(28)

•民族精神研究•

庄子心、性思想研究

张松辉 张 景(40)

•传统与现代•

华夏上古思想的主要源头与“三和”思想的现代意义

蒋广学(48)

论道家、道教中和均平的社会发展观

孔令宏(58)

• 易学研究 •

《易传》作者问题检讨(上)

郑吉雄 傅凯瑄 (62)

解象、释名、析理

——《周易》与中国哲学的论说方式

张丰乾 (77)

• 《管子》思想研究 •

《管子》四篇哲学思想对《淮南子》的影响

刘爱敏 (83)

《管子》四篇中的养生理论与幸福观

尚建飞 (90)

• 人物春秋 •

禅宗六祖慧能衣钵去向考释

林有能 (97)

• 书评 •

铸民族文化伦理之魂

——《伦理与传统伦理论集》自序

肖群忠 (109)

船山诗文赏析(十)

心 广 (112)

Main Contents

译校:章敏

- On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*Chuanshan Journal*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
of China Zhang Jingping(01)
- On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and Value Construction of Wang Fuzhi's
"Universal Morality in all Ages(Gu Jin Zhi Tong Yi)" Wang Zeying(08)
- On the Secular and Refined Orientation of Wang Fuzhi's Thoughts of Scholar's
Personality Li Changtai(17)
-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tilitarianism Thoughts Between Wang Fuzhi and Tang Zeng
..... Lai Jingyang(23)
- A Brief Analysis of Three Articles by Yang Kaihui in 1921 Li Zhongze (28)
- On Zhuangzi's Thoughts of Human Nature Zhang Songhui,Zhang Jing(40)
- The Main Source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and the Modern Value of
"the Three Harmony" Thoughts Jiang Guangxue(48)
- On the Daoist and Daoism's View of the Equa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Kong Linghong(58)
- A Retrospect of the Disputes on the Authorship of the *Zhouyi Commentaries*
..... Zheng Jixiong, Fu Kaixuan(62)
- Explaining the Figures, Interpreting the Names, Analyzing the Reasons:
On the *Book of Changes* and the Discourse Mode of Chinese Philosophy Zhang Fengqian(77)
- The Influence of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the Four Articles in Guanzi
on Huainanzi Liu Aimin(83)
- The Theory of Nourishing of Life and Eudemonia of the Four Articles in Guanzi Shang Jianfei(90)
-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Whereabouts of the Sixth Patriarch Huineng's Mantle Lin Youneng(97)
- Cast the Ethical Spirit of National Culture; The Preface of *Essays on the Ethics*
and *Traditional Ethics* Xiao Qunzhong(109)